

由“永历入缅”叙事文本演变看边疆地区的王朝认同与国家认同

姚 胜

摘 要: 顺治十五年年底至次年年初,在清军的进逼之下,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由云南逃入缅甸,四年后被清军押回昆明处死。此后,永历帝陪臣率先建构“狩缅”叙事,通过刻画朱由榔的仁君形象,以突出前明遗民对明朝的认同。清朝官方并不承认朱由榔的皇帝身份,而只将其视为明末一普通藩王。由此,该叙事由前明遗民的“狩缅”转变为清朝的“走缅”。随着统治逐渐稳固,清廷放松了管控,仍以“狩缅”为主题但淡化了明、清王朝书写的“永历叙事”在云南再度发展。清末革命兴起,在云南革命党人的重构之下,“狩缅”叙事进而成为民主革命动员与国家认同宣示的工具。清初至民初,从“狩缅”到“走缅”再到“狩缅”的叙事演变,反映了不同立场的对立、不同群体的诉求及不同时代的主题。

关键词: 永历;朱由榔;缅甸;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10-0122-11

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宗室在南方相继成立了多个小朝廷,永历朝廷是其中的最后一个。1658年年底,永历朝廷在清军的逼迫下从云南逃往缅甸,四年后永历帝朱由榔被清军捉回昆明处决。学界关于“永历入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入缅”的背景、原因及影响^①。然而,永历“入缅”虽然只是发生于清初的一段史实,但永历“入缅”叙事则有着一个较长时段的演变过程。如果将目光从清初延展至清末民初,我们就会发现“入缅”的相关文本不断延绵辗转,推陈出新,形成与有清一代相始终的四阶段叙事。四个阶段叙事主体分明,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对“入缅”叙事及其文本演变过程,学界尚无人关注。本文旨在通过耙梳文献,从不同阶段的叙事主体如何建构、改订、发展及重构叙事入手,考察“入缅”叙事的文本演变过程,揭示“入缅”叙事主题的变迁,特别是后期叙事者从王朝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变。

一、永历遗民的叙事建构及其明朝末帝的历史书写

最早的“入缅”叙事由三部著述组成,即邓凯《也是录》^②、刘苴《狩缅纪事》^③、杨德泽《杨监笔记》^④。作者均为永历朝廷遗民。邓凯与刘苴是朱由榔陪臣,杨德泽为后宫宦官。《也是录》自叙介绍,邓凯为江西吉安人,官至永历朝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扈从朱由榔一路逃入缅甸,并一同被清军捉回云南。朱由榔死后,邓凯在昆明出家为僧。刘苴,籍贯一说为蜀人,一说为滇人,朱由榔死后留居云南^⑤。清初安徽桐城人方孝标曾游云南并与刘苴会面,听其讲述永历旧事^{[1]287,289}。《杨监笔记》自叙杨德泽祖籍湖北麻城,孩童时流落云南,八岁净身入宫。从其为朱由榔母亲、女儿送终的记载来看,杨德泽最后很可能陪同其去了北京。考虑到三位作者与

收稿日期:2024-07-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12&ZD13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8批面上资助(2020M683385)。

作者简介:姚胜,男,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089)。

永历朝廷的关系,三部撰述的绝大部分内容当为作者亲历或亲闻。这三部撰述建构了“入缅”叙事的基本框架以及朱由榔的仁君形象。这一时期的“入缅”叙事,也可被称为“狩缅”叙事。

1. 遗民叙事中明朝末帝的艰难“狩缅”

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二月初八,清军占领贵州安龙,进逼云南。在短暂的“幸蜀”还是“幸缅”犹豫之后,十五日,朱由榔逃离昆明。二十日,朱由榔逃离楚雄。二十一日,李定国弃守昆明。二十四日,朱由榔逃至赵州。顺治十六年正月初四,朱由榔逃至永昌,四十天后,“清人犯玉龙关,巩昌王白文选败走,直入永平冲漾碧,上仓卒移幸”,同年二月十五日^⑥,朱由榔逃离永昌。此后李定国在潞江(今怒江)磨盘山伏击清军失利,朱由榔于二十五日逃至盩达土司。二十六日进入缅关,二十九日抵达缅甸蛮莫^⑦。此后,朱由榔在缅甸寓居两年。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清军兵临缅都阿瓦城下,缅甸交出朱由榔。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十二日,朱由榔被押回昆明。四月二十五日,朱由榔被杀。六月,李定国病死^⑧。

从昆明入缅,朱由榔基本是一路奔逃,除在永昌喘息四十日之外,前后两段几乎马不停蹄,日夜兼程。逃离昆明时场面凄凉:

只见省城内外老少人等拈香随辇,遮道而哭要随驾上永昌去。皇上见时大哭曰:“尔等俱宜回去。俟中兴之日,再与尔等相会。此还是我贻害了你众百姓了。”这些老少闻言,哭声震地,恋恋不舍。^{[2]556}

此般情形,在《杨监笔记》中随处可见,给人印象是朱由榔虽为亡命但不失为仁厚之君^⑨。为逃入缅甸,朱由榔在缅人要求下,竟荒唐地下令全体缴械^{[3]7},这为其在缅甸的悲惨命运种下了祸根。此后两年,整个永历朝廷及官员家眷在缅甸生活颠沛、任人宰割。

作为永历朝廷的军事统帅,晋王李定国承担着抵御清军、护卫朱由榔的重任。朱由榔逃离沿途,李定国一共部署了三次阻击战,却屡战屡败。逃离昆明时,李定国“令总兵王惠带三千人马去守草铺,又令总兵潘融带三千人马在丰禄县镇守,又令左路将军窦名望带五千精兵在此镇守”,“又令副将王镇带五百能走的步兵藏在安宁州探听清兵的消息”^{[2]557}。朱由榔于十二月十五日逃离昆明,不到一周,李定国就于二十一日弃守昆明。清军进攻大理玉龙关,李定国命白文选抵抗,不敌,败走。腾冲

磨盘山伏击清军,李定国仍然大败^{[3]6}。据《杨监笔记》记载,李定国听闻伏击失败、老将窦名望阵亡时,“大叫一声,晕死在地”^{[2]563}。此后朱由榔进入缅甸,李定国只得引军游击于滇缅边境,无力回天。

当朱由榔被捉回昆明之后,《狩缅纪事》有一段清军满洲八旗一部欲挟朱由榔自立的记载:

时满洲有甲喇章京,少年骁勇,阴连满人之壮健者,自称平汉王,刻印缮装,乘城中演戏,约以戏场举事。欲先入王府,然后劫上驾入秦,尽杀汉中中营,故以平汉为号,已布置定妥。会章京性颇严急,有小子过犯,扑责将毙,置之马房,小子乘夜走出,报与白旗卓固山。擒章京以下共十一人。^{[3]20}

《也是录》与《杨监笔记》对此均无记载,但《杨监笔记》有一段关于清军将领爱星阿在缅甸“朝见”朱由榔的记载^{[2]570}。康熙三十年成书的《云南通志》只记载“四月,官兵厄儿特洒出等谋叛伏诛”^{[4]94},未将其与朱由榔加以联系。不过,五年后成书的《云南府志》则记载:“吴三桂送永历至省,人心未定。正蓝旗章京厄儿特乘机同本固山邵尔代、牛录下洒出莽出纠官兵录间色对等割辫为号,约初二日谋反,往汉中立厄儿特为王。机泄,吴三桂、爱星阿、卓罗擒获逆党,请旨正法。”^[5]部分清军谋叛之事当属可信,《狩缅纪事》将清军谋叛与朱由榔嫁接一处,突出其“仍为天子”的立场,表明永历遗民虽已入清,但仍效忠前明。

对于朱由榔、李定国之死,三部撰述中只有《狩缅纪事》给予了记载且笔墨较多。朱由榔死于四月二十五日,“是日辰时,天气晴朗,巳时忽然霾暗,大雷雨。滇人如丧考妣,罢市哀恸。各街士民假称丁艰丧服,半皆缟素”^{[3]20}。六月,“上被执音至,晋王大哭撞胸,郁郁成疾。是时通营马死几半,晋王乃具表告上帝云:‘大明数尽,何必死马死兵,但当绝臣一人,则数万人星散矣。’次日即抱病不起”。“十七日薨。”^{[3]21}《狩缅纪事》对李定国评价两分,先借滇人议论之口高度肯定李定国之死“大有田横之风,不若白文选束甲来降,气节扫地”^{[3]21},接着直指“晋王误国之罄,即一死但可赎其半尔”^{[3]22}。

2. 遗民叙事中明朝末帝的仁君形象

叙事建构之后,拥有前明遗民心理的文人,在朱由榔陪臣“狩缅”叙事建构的基础上,展开了进一步的补充与扩展,特别是对朱由榔,着力刻画其仁君的形象。有着强烈抗清情结的广东番禺人屈大均撰《安龙逸史》,在《杨监笔记》的基础上增加了“途经

碧鸡关”^⑩的说法。

上至碧鸡关,见兵民塞路不前,哭声震动天地。上谕住辇,起立,手扶天波左肩,回顾城中宫阙,挥涕曰:“朕行未远,已见军民如此涂炭,以朕一人而苦万姓,诚不如还宫死社稷,以免生民惨毒。”谕毕大哭。天波俯伏奏慰,定国飞骑亦至,共慰上怀,请御辇前发,以慰众心。上不得已就辇,然从行人众。^⑪

《安龙逸史》还多出了一段李定国“保护仓廩”的叙述:“时秋粮已征贮,定国谕各营不得毁其仓廩,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同书紧接其后的“或曰上谕晋王,令勿烧毁也”^[6]¹¹⁸一句则暗示朱由榔宅心仁厚。佚名的《明末滇南纪略》进一步暗示毁仓动议之人为巩昌王白文选,接着描述了一番李定国当时的心理动态:

晋王于十二月十六日回至省城,与巩昌王等议,欲烧仓廩朝堂府署,惟留一空城。晋王云:“我等到云南十余年,也作践百姓勾了,若不留下仓粮,深为民累。”于是不烧仓廩官署,腾城而去。^⑫

对于朱由榔之死,后出遗民撰述不仅沿用《狩缅纪事》的方式,以天气突变烘托悲情,更增加了“二龙西逝”的场景。胡钦华《天南纪事》记载:“时日在禺中也,大风四起,黄霾蔽天,俄而雷雨大作,平地水高尺许。云中若两龙蜿蜒西逝。”^⑬署为“旧京孤臣金钟编辑”的《皇明末造录》记载:“是日晴天无云,忽霹雳大震,云雾塞天,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滇人老稚悲恸。”“共见有黑白二龙上腾天际云。”^⑭《行在阳秋》则增加了朱由榔太子痛骂吴三桂的情节:“黠贼!我朝何负于汝,我父子何仇于汝,乃至此耶!”^⑮

朱由榔死后,《狩缅纪事》记载李定国焚表告天,不久抱病而卒。《皇明末造录》则称其绝食而死:“六月二十七日,晋王李定国闻驾崩,不食数日,卒于猛腊。”^[7]《入缅始末》的描述则更为详细,当闻知永历帝及太子被清军执回云南,李定国仍图谋营救:

会定国营中人马病死日甚一日,定国乃斋戒作表陈:“生平行事,继反正辅明,皆本至诚,何皇穹不佑,致有今日。禱于天,若明祚未终、皇上可救,乞顺某所为、车马无灾,俾齐心努力出滇救主;如果大数已定,皇上无救,乞赐某人早死,无害此军民!”五月十五日焚表,六月十一日定国生辰,是日病作,旋闻行在及太子遇

害,仰天大恸,病遂笃。

二十七日夜,定国卒。^⑯

在“狩缅”叙事中,永历帝朱由榔无疑是中心人物,晋王李定国则与朱由榔构成了一个“双星系统”。朱由榔逃亡山穷水尽,李定国护驾回天无力。这些撰述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个画面,无不呈现永历遗民对“皇上”朱由榔的无限哀思。叙事者效忠的王朝——明朝虽已不复存在,但仍刻印于前明遗民心中。

二、清朝的叙事变更及其对朱由榔身份的贬抑

1. 清廷改订叙事及其对民间的影响

“入缅”叙事属于清朝国家“前明”历史撰述的一部分。清朝甫一入关,即于顺治二年提出修撰《明史》之议。清朝官修《明史》前后用了近百年,数易其稿,才于乾隆四年(1739年)最终完成^⑰。在官修《明史》中,明祚终于何年以及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如何定位是重大问题。清朝官方长期坚持“明亡于流寇”及“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立场^⑱,将明祚终结断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虽然此后乾隆皇帝将明亡时间后推一年至弘光元年(1645年),但对于朱由榔的态度,清廷不仅始终未承认其所谓前明天子地位,甚至对于其“藩王”的地位,还有一个从“特殊藩王”降为“普通藩王”的过程。“关于南明帝王史事,由最初讨论为依据《宋史·瀛国公纪》体例,附于《崇祯帝本纪》论赞之末,到独成《三王传》,附于《诸王列传》之后,而最终改置于其始封诸王之末。”^[8]不仅如此,《明史》仅在第一次提及朱由榔时称其“崇祯时,封永明王”,之后直书“由榔”“走缅”,记载非常简略^[9]。清廷不能容忍前明遗民将朱由榔尊为正统天子的做法,遗民的“狩缅”叙事也就在清朝一方变成了“走缅”叙事。

一开始,民间叙事者似乎对清廷这一政策尚无意识。刘献廷的《广阳杂记》记载了早年居滇后流寓衡阳且“知滇事最详”的吉坦然的口述,其中对朱由榔有一番描述:

永历面如满月,须长过脐,日角龙颜,顾盼伟如也。

是日天极晴朗,忽有黑云起,风雷交作。城外里许,有金汁湖,在归化寺侧,民储水灌田者也。有龙出于中,蜿蜒升天,头、角、爪、牙皆见。^⑲

刘献廷性情疏阔,在妻子张氏去世后,“慨然欲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博采轶事”。刘当于此时前往湖南,得闻吉坦然所言^⑩。温睿临在《南疆逸史》中记载:“帝丰颐伟干,貌似神宗而性恶繁重,亦颇似之。无声色玩游嗜好,不饮酒。虽不甚学而喜闻讲论忠义,事两宫尽孝。蒙难之日,暴风雷雨,昼晦。”^[10]《南疆逸史》一书,系温睿临在万斯同的提议之下撰成,写作和成书年代在万斯同逝世之后,约当康熙后期^⑪。刘献廷《广阳杂记》成书早于温睿临《南疆逸史》,但后者对朱由榔的描述,未采用前者所收之吉坦然口述,抑或温氏写作时未见及刘著。刘献廷、温睿临二人未受清廷迫害,但庄廷铨、方孝标、戴名世等却受害惨烈^⑫。戴名世《南山集》案系受方孝标《滇游纪闻》一书所牵连^⑬。他们只是没有“政治敏感性”而已,并非真的有意要去“尊明”“抑清”甚至“反清”。刘、温二人均曾供职清廷明史馆,二人虽未全然服从清廷政策,但也谈不上有什么遗民情结。

但是,清廷通过延续四朝的文字狱对“尊明抑清”的私修前明撰述及其作者进行摧残,必然会对清代私人撰述者造成影响。我们能看到,虽然清代前期出现的一批关于“永历入缅”的撰述的成书时代与遗民撰述重叠,但其立意则截然不同,不仅将笔墨主要着墨于“入缅”具体过程的补叙,在年号、尊号的处理以及叙事的态度上也与清朝官方政策相吻合,即前明君主“狩缅”变成了前明藩王“走缅”。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明季南略》《续编绥寇纪略》和《劫灰录》^⑭。

顺治十六年正月初三,即朱由榔驻蹕永昌的前一天,“三桂收复云南”^{[11]478}。初八,“三桂克取罗次”。此后,清军未有穷追,而是在滇东停留了一个月,稳定局势,“移檄远近,招抚云贵之未降者”^{[12]137}。顺治十六年二月初二,清军吴三桂部自罗次挥师西进。初十,大兵“追败王国勋兵于普溯。十五日,至大理之玉龙关,白文选、张光翠、陈胜等俱战败”^⑮。大理府与永昌府接壤。朱由榔闻讯于十五日撤离永昌。十八日,吴三桂同征南将军进入永昌,“士民焚香手额。抚毕出城,戒无侵扰,即严师前进”。“二十四日,取腾越州。二十五日,过南甸,追至孟村,离腾越百有十里,为云南迤西尽界,外即三宣、六慰、缅甸。三十日,振旅班师。”^{[11]479}。二十五日当天,清军与永历朝廷仅相距二百里。假如清军加快行军速度,加大军事压力,或许朱由榔在进入缅关之前就会被清军擒获。与前明遗民的叙事视

角不同,清人叙事明显是清军追击穷寇的视角。

对于朱由榔之死,清人叙事或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明季南略》仅记:“缅人遂执永历及其母太后等,并从官家口献军前。”“未几,定国死于景线,云南悉平。”^{[11]483}完全回避了朱由榔之死及其死况。《续编绥寇纪略》记载:“四月二十五日,同太子皆遇害。是日昼晦,大雷烈风,雷雨交作,滇人异之。”^{[12]143}《续编绥寇纪略》所记信息略详,但与遗民的仁君叙事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

2. 民间叙事文本的“改窜”与回避

清廷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影响是所谓“改窜”文本的出现。《劫灰录》与《见闻随笔》的互文关系争议不断。刘献廷称:“《劫灰录》,乃冯甦所著。”^[13]《见闻随笔》收有三篇序文,均称该书为冯甦所撰,其中毛奇龄在序中称:“《见闻随笔》者,司寇冯先生所著书也。”^⑯叶廷琯疑撰者为方以智、钱澄之之辈^⑰,傅以礼认同叶廷琯所言^[14],但朱希祖则认为《劫灰录》袭自《见闻随笔》下卷^⑱。谢国桢判断“此二书恐系一书而析为二者”^{[15]547}。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则与朱希祖正好相反,该所在其点校出版的《野史无文》前言中认为“珠江寓舫偶记的《劫灰录》”,“曾被冯甦收入《见闻随笔》作为下卷”^⑲。《见闻随笔》卷下《永明王始末》《沐天波》《李定国》等传,内容与《劫灰录》之《永明王僭号始末》《沐天波传》《李定国传》基本相同,后者则多出《大临始末》《舟山始末》《延平始末》三传。《四库提要》称:“国朝冯甦撰,甦有《滇考》,已著录。”“盖时方开局修《明史》,总裁叶方蔼以甦久宦云南,询以西南事实。因摭所记忆,述为此编,以送史馆。毛奇龄分纂《流寇传》,其大略悉取材于此。”^[16]无论如何,《劫灰录》与《见闻随笔》当为同出之书,而《见闻随笔》为呈清廷明史馆所用。

《安龙逸史》与《残明纪事》也是一对重要的互文撰述。二书内容几无二致,当为同出。《安龙逸史》的序称:“初得《也是录》,既序而识之矣。兹以避兵武阳,复睹《安龙逸史》一书。”^{[6]76}《残明纪事》的序称:“初得《也是录》,既序而识之已。兹避兵阳武,复得《残明纪事》一编。”^[17]郭影秋认为《残明纪事》原为屈大均《安龙逸史》,“由王渔洋改窜而成”^[18]。谢国桢认为《安龙逸史》当系屈大均所撰^{[15]558},并认同郭影秋的看法^{[15]570}。吴航认为《残明纪事》上交清廷明史馆时,为王士禛所篡改^⑳。《残明笔记》与《安龙逸史》在王朝认同上差异明显,《残明纪事》称朱由榔为“王”,清为“大

清”,《安龙逸史》则分别将他们称为“上”与“清”。

不仅有一书改为另一书,还有杂合多书“改窜”为一书的情况。邵廷采编撰的纪传体《西南纪事》^③,篇目与《劫灰录》《见闻随笔》相似,但该书卷十《李定国传》与本文第一节提到过的《入缅始末》的内容基本相同。邵廷采生于顺治五年,《西南纪事》成书当在康熙中期。《入缅始末》较《西南纪事·李定国传》多“自铜壁关入缅事悉载邓凯《也是录》”^[19]一语。据此可知,《入缅始末》成书于邓凯《也是录》之后,而后又被邵廷采改为《西南纪事》之《李定国传》。《西南纪事》将清朝称“大清”,拾格,《入缅始末》为抄本,只称“清”,无拾格。二书“改窜”路径所见之清朝国家政策的影响亦十分明显。

不书写也是一种书写。康熙三十年至四十年之间修撰的《云南通志》及《云南府志》^④,虽有朱由榔入缅史事,但记载十分简略。康熙《永昌府志》仅附记有“缅甸死节烈女十一人”事^[20]¹⁰³³。至于南明遗民建构“狩缅”叙事的三部撰述,《云南通志》《云南府志》及《永昌府志》中的“艺文志”,则完全没有收录。

3. 清朝中后期官方对叙事钳制的放松

清朝在进入乾隆朝之后,早已成为以大一统为己任的华夏正统。康熙帝禁谈夷夏,雍正帝颁布《大义觉迷录》以地域来解构华夷之辨,乾隆帝则反对满族是夷狄的观念并以华夏自居。此时,国内民族矛盾渐趋缓和,阶级矛盾、国家秩序、君臣大义成为清朝统治者关注的核心^[21]。清廷完成《明史》编修,并通过编纂《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明确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⑤,进而通过编修《四库全书》禁毁违反统治阶级思想的图籍,清朝对于“前明叙事”的自信得以建立起来。同时,前明遗民相继谢世,文人民族意识和反抗斗志日渐淡漠,以修史来反清的活动基本走向了沉寂。在这样一种社会普遍观念的转向之下,清朝又通过对胜朝忠节之士的褒扬以及对前明降臣洪承畴等“贰臣”的贬斥来强化忠君节义的意识形态,并延伸至民间。由此,清廷不再刻意强调正统问题,而主要关注王朝治理的历史教训,以宣扬君仁臣义主题再现的“狩缅”叙事即便有所犯忌,也未见清朝像对“明史案”那样大动干戈。

成书于乾隆十三年《燭火录》在记述朱由榔之死时,增加了对其体貌异相的描述:

永历双手过膝,两耳垂肩,足指甲如手能拳曲。其被执入滇也,万民观之,莫不流涕,曰:

“有此异相,何为而若是耶?”^⑥

如果按照朱由榔只是普通藩王的政策,该书不可能对朱由榔做如此描写。咸丰十一年(1861年)成书的《小腆纪传》以“上”称朱由榔,对其死时的记载,不仅沿用了风云变色、太子痛骂和二龙冲天的情节,还完全抄录《南疆逸史》的文字对朱由榔的神态秉性大加叙述。《小腆纪传》作者徐鼐,江苏南京六合人,道光进士,曾充任实录馆协修官。作为清廷史官,徐鼐在《小腆纪传》中甚至突破清朝关于明祚终结的官方政策,写道:“六月,招讨大元帅晋王李定国卒。明亡。”^[22]光绪朝成书的《滇事总录》也沿用了风云变色和黑龙冲天的说法,并就朱由榔形象写道:“永历仪观甚伟,还滇居四十日,束黄丝带,举止有度。”^[23]¹⁰⁶

当清朝进入咸丰时期,对王朝与民族对立的强调早已退出社会的主流舞台,不仅清朝对“入缅”叙事的钳制已悄然丧失,民间也失去了“自我审查”的意识。“小腆”,一说“小国”,一说“余孽”。《滇事总录》的序称:“翰龙兴东土,统一区夏,小腆群仇与藁悉除。”^[23]⁹²徐鼐身为清廷史官,所撰之书以“小腆”之名指斥南明,书中内容却突破清廷禁忌,恐怕不仅他自己没有犯禁与否的意识,清廷对此也无以为意^⑦。此外,咸丰时期的“入缅”叙事与南明“狩缅”叙事的其他部分还是有着巨大差异的。康熙元年,朱由榔死于吴三桂之手,朱由榔母亲、女儿入京之后却获得清廷宽待并被赡养终老。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叛清,继而成为遗民与清廷共同的敌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后期撰述者在明—清王朝思想认识上的张力,清王朝也在这段时期淡出了“入缅”叙事的场域。

三、云南乡邦的叙事发展及其关于中原天子驾临边疆的表达

早期无论是强调“狩缅”还是“走缅”,叙事参与者多来自江南^⑧,但作为事发地的云南并未一直置身事外^⑨。虽然仍然属于“王朝认同”,但与遗民和清朝所持“王朝正统为谁”所不同,云南乡邦强调的是“王朝主体认同”。对于云南来说,朱由榔是“狩缅”还是“走缅”并不重要,甚至清朝是否承认朱由榔为天子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云南乡邦认同朱由榔是天子,更重要的是这位天子驾临过云南,云南是天子临幸过的云南。

云南乡邦的“狩缅”叙事,始于“永北刘彬先生

遗稿”《晋王李定国列传》。该传记载,当闻知永历帝为吴三桂所擒后,李定国“叫绝大哭曰:‘恢复事尚可为乎?负国负君,何以对天下万世!’披发徒跣,号踊抢地,两目皆血泪,不食七日而薨。时年四十九,明亡”^⑳。咸丰时期的徐薰将明亡断于李定国死的处理,或源自此。刘彬,云南永北人(今丽江永胜),原籍安徽霍邱,其父刘星海曾随朱由榔由粤入蜀抵滇,以功擢至总兵。“永历狩缅”后,刘星海隐居大理,因事戍守古塔,后为刘彬迎归^㉑。

另一云南本省叙事为立于雍正元年(1723年)的供佛碑,题为“云南腾越协中军守府纪录一次张施灯供佛碑记”。碑文如下:

盖闻古佛传心,灯炳三乘之华藏;如来融慧,炬彻万亿之山河。灯之于空门也,亦甚要矣哉。燃点白毫,光中不特明心见性;朗耀青猊,座上更得永命永年。当披览舆图,隆昌之西有山名曰玳瑁,山脐建有西宁禅寺。粤稽由来,自明永历皇上西行,西府晋王李协同创建。世阅两朝,年逾百十,基址旧矣。

大清雍正元年孟冬月吉旦 住持僧海天徒寂林^㉒

碑文内称,西宁禅寺为朱由榔、李定国君臣所建。揆诸康熙《永昌府志》,永平县无西宁禅寺而有永国寺,“在叮咛山半,旧在顶,僧书常建。康熙三十六年知县程奕移建今处”^{[20]995}。民国《永平县志稿》记载该寺“旧在叮咛山顶,明僧书常建,清康熙三十六年知县程奕移建于山之平坦处”^㉓。西宁禅寺当为永国寺,不过该寺由明僧所建而非永历君臣所建。

碑文中的玳瑁山即博南山^{[4]167}。博南山山势虽非险峻,但道路较为崎岖。由永平县城往西,须翻越博南山,然后沿山势辗转而下至谷底澜沧江边的霁虹桥,过桥八十里才能抵达永昌府保山县(今保山市隆阳区)^㉔。朱由榔从昆明到永昌,历经二十一日,中间未有停歇。《也是录》记载,“十五日离滇”,“己亥正月四日入永昌府”^[24]。《狩缅纪事》的记载较为详细,“十五日丁丑,上发云南”^{[3]4}，“是日,驾至安宁”,“二十日壬申,上自楚雄发驾”,“二十四日丙子,上至赵州”,“己亥十三年,正月初四日丙戌,上踣永昌”^{[3]5}。《狩缅纪事》在朱由榔抵达赵州之后继续记载:

是时,清师逼交水,晋王于二十一日即奔云南。上走,金维新先与吉翔定谋,至是,如翔言说晋王走永昌。晋王遂命行营兵部侍郎龚应禎

星驰前行见驾,具奏幸永昌事。应禎追至赵州,奏如前,上遂定幸永昌。^{[3]5}

《狩缅纪事》给我们透露的信息是,朱由榔在赵州得知清军入滇,李定国已于三日前撤离昆明。从《杨监笔记》中可以看到朱由榔从昆明至永昌,“已走了二十一日,无一日不受惊”^{[2]557}。朱由榔从昆明撤至赵州只用了十天,从赵州到永昌也用了十天,形势危急加上博南山道路蜿蜒崎岖,朱由榔纵有时间也断无可能在山中停驾驻蹕。李定国则一直在为朱由榔断后护卫,直到永昌君臣二人才得以相见^{[3]6}。

朱由榔、李定国君臣在西逃途中,并未在永平相遇,更没有时间创建寺院。“协同创建”寺院一说,当属时人想象。不仅在滇西,在省城昆明,也有对朱由榔的想象事迹。最早三部陪臣撰述并无朱由榔撤离昆明时途经碧鸡关的记载,碧鸡关一节最初系《安龙逸史》基于《杨监笔记》有关朱由榔撤离昆明时遇军民哭挽情节而做的添设。成书于乾隆二年的《滇云历年传》则在《杨监笔记》与《安龙逸史》的基础上多出了“为停碧鸡关三日始行”的说法^[25]。不过,历史的真相是,仓皇西撤的朱由榔于当天即抵达安宁,不可能在碧鸡关停留三日。《滇云历年传》的作者倪蜕为清代雍乾时人,去康熙已久,此说既是康熙时期诸撰述的延展,恐怕也是为丰富朱由榔仁厚形象而故意为之。倪蜕原本松江人,“初从巡抚甘国璧入滇,至老,买山于昆明西礪村,遂占籍焉”^[26]。倪蜕撰写《滇云历年传》时,已属滇人书写滇事,不可能不为滇省民间传说所影响。

云南对朱由榔的想象在“腾冲大救驾”传说中得到进一步扩大。“大救驾”是腾冲一道著名的地方菜肴。“狩缅”途中,清军突破下关,攻占大理,直逼永昌。朱由榔得到消息,立刻从永昌逃至腾冲。传说当时天色已晚,君臣一行人走了一天山路,疲惫不堪,饥渴难耐。幸而遇到一户农家,农户把家中保存的食物炒在一起,做成了由饵块、火腿、鸡蛋、青菜组合而成的一盘菜。朱由榔吃后赞不绝口地说:“炒饵块救了朕的大驾。”“大救驾”由此得名。这段传说不见于清代方志,具体由来已无从考证,但腾冲民间认定,大救驾发生的地点在今腾冲市腾冲镇(原洞山乡)胡家湾村。清末粤人、署腾越厅同知黄炳堃有诗题为《食饵块》,对饵块赞誉有加,称其“湖湘甘载游,兹名已先播”。该诗题注“饵块,腾越胡家湾产最佳”^[27]。“腾冲大救驾”明显是“珍珠翡翠白玉汤”的翻版,故事背景、主角身份、叙事模型

几无二致。“白玉汤”的故事有两个版本,主角分别是龙兴之前的朱元璋和庚子西狩的慈禧太后。由此可见,腾冲百姓并未嫌弃朱由榔丧家犬般的落魄,而是将之视为与君临天下的明太祖朱元璋一样的君王。朱由榔虽然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亡命皇帝,但毕竟顶着一个“皇帝”的帽子,因而仍为民间所津津乐道。与此类似,滇西还普遍流传建文帝隐居此地的传说及所谓“圣迹”。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牛街镇观音山有“眠龙洞”,洞中供奉着明朝建文皇帝神主。当地人传说,此即“靖难”之后朱允炆隐居之地^{④3}。

四、云南革命党人的叙事重构及其对国家认同的宣示

清朝灭亡前夕,民主革命兴起,“狩缅”叙事得到了以云南辛亥革命重要人物、腾冲人李根源为代表的云南革命党人的高度重视与积极重构。

李根源^{④4},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在日创办《云南》杂志宣传革命思想^[28]。1908年,受《云南》杂志委托,李根源和吕志伊编辑了一本特刊《滇粹》,专门搜集明朝云南历史轶事^[29],借“明臣明事”来进行革命动员^[30]。其中就有《也是录》及上文所述之永北刘彬的《晋王李定国列传》,以及另从日本人石村贞一《元明清史略》及丸山正彦《郑成功传》中辑出的《永历帝纪》与《附录永历帝贻吴三桂书》。此外篇目也均为与明代云南有关的著名英雄人物及其传记,如与傅友德一道平定云南、后被封为黔国公、世守云南的沐英,抗倭援朝名将刘綎、邓子龙,七下西洋的三保太监郑和等等^{[31]384,385}。永历遗民刘彬在《晋王李定国列传》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明朝灭亡的悲恸以及对永历君臣朱由榔、李定国的讴歌,极具感染力,令人动容。明史的编撰,特别是对永历朝廷以及朱由榔逃缅后又被捉回昆明处死的悲剧性命运,成为革命党人有力的宣传动员武器。

清代滇西一直保持着朱由榔、李定国君臣二人及永国寺的历史记忆。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1912年1月,李根源与剑川名宿赵藩途经永国寺,刻石立碑,碑文由赵藩撰写,内容如下:

明季,晋王李定国与清兵曾战于此山上。永国寺犹奉永历帝君臣粟主。晋王所题“宁西禅寺”木榜四字犹悬殿楣,惟石榜“毗卢宝座”四字则仅中二字存矣。中华民国光复之元年正月,腾越李师长印泉与余有事西南,道经山中,

考图经,游旧刹,发思古之幽情,题名立石以念来者。^{④5}

从前文供佛碑记可知,云南乡邦对永历帝的记忆甚至地方性崇拜,至少在雍正时期即已有之。赵藩所撰写的碑文内容,并非仅为其与李根源个人的思想反映,而是滇西较为普遍的历史记忆。

除了碑记,赵藩还作两首七律。其一《永国寺》,其中“宁西禅寺当官道,寥落惟余竹柏邻。社屋久遗明帝憾,榜书如写晋王真”^[32]二句指出木榜“宁西禅寺”系由李定国所书。赵藩所作另一首七律《杉木和杂诗》则有“君臣香火寄禅居,明社难扶大愿虚。不重巍巍八铜佛,重他六字晋王书”^[32]二句,也是在强调“宁西禅寺”与仅存的“毗”“座”二字系李定国亲书。结合碑记与七律,可以看出赵藩对“狩缅”叙事增补了三段内容:一是李定国在博南山中与清军作战;二是永国寺一直供奉着永历君臣二人的神主;三是君臣同心,朱由榔、李定国二人分别题写木榜。

此后,与李根源同属永昌府的永平人李忠本作《博南山记》,并进一步表示,永国寺额为永历帝亲笔所题,而“毗卢宝座”“宁西禅寺”则是分别由永历帝与李定国所题写的。另一永平人喻德美作《杉木和记》,亦称永历帝曾驻蹕永国寺,晋王李定国与清兵鏖战山中,永历帝题“毗卢宝座”,李定国题“宁西禅寺”。喻德美称“剑川赵藩补书寺额”,亦当认为永国寺额原为永历帝御笔,因年久颓败,故由赵藩补书^{④6}。李根源同乡、腾冲人杨大纯作七绝《永平永国寺》,其中“古殿阶前两树花,晋王手迹在天涯”^{[33]2138}一句,亦当指“宁西禅寺”系由李定国所题。另一腾冲人刘楚湘曾作七律《永国寺》与《经博南山永国寺》。

《永国寺》云:

煤山殉国明运终,福唐蝉继夕阳红。桂王拥立诚琐尾,贼臣蠹质寄安隆。晋国崛起原流寇,薰莸十年不同臭。一朝慷慨动三军,哲将双手扶明胃。遂举义师匡王室,金马碧鸡驻御蹕。励志兴复旧山河,天意不属奈若何?至今惟遗永国寺,西风残月含幽意。殿前山茶雨树蟠,年年放花心尽丹。^{[33]2058}

《经博南山永国寺》云:

南服播迁社已倾,永终历数叹朱明。挥戈竭尽回天力,呕血空余报国情。千古巍巍瞻庙貌,满山谡谡听松声。博南越过趋行急,未得心香一展诚。^{[33]2059}

二诗不仅意在凭吊永历君臣,更是对李定国虽尽心竭力匡扶明朝却仍回天无力、悲愤而亡的叹惋与同情。

虽然滇西普遍存在有关“永历君臣”的历史记忆,但朱由榔在“入缅”途中并未在博南山驻蹕,“晋王李定国与清兵曾战于此山上”也并非历史事实,君臣二人题写寺额及木榜很可能是李根源、赵藩等人的有意杜撰,但刻画明清鼎革背景下的李定国与清兵的鏖战,大力宣扬君臣二人的同心,与当时清民鼎革的时代背景是相吻合的,同时也是李根源等人发动云南辛亥革命的“合法性”的重要证明。

在李根源与赵藩的影响之下,永国寺获得了更多的关注。1912年,李根源不仅到了永国寺,还陪同赵藩去了鸡足山,并在鸡足山悉檀寺天王殿获得李定国令谕一纸。李根源对此甚为珍爱,称其与永国寺“宁西禅寺”木榜可为“双璧”^[34]。同年,李根源再次重申永国寺为“永历帝驻蹕时所建”,并飭令永昌府重修永国寺,对永国寺修缮、保护以及资金来源做了详尽安排和严格要求^[35]。1916年,永平县奉命重修该寺并刻石立碑^①。李根源对李定国的情感,直到其晚年仍十分强烈。1962年,李根源撰文高度评价李定国“对辛亥革命所起的鼓舞作用”,自叙其迁滇十世祖李镇雄曾隶李定国麾下练兵,一度保护永历皇帝“狩缅”^[36]。

有清一代,除雍正时期的供佛碑记之外,云南地方文献尤其是永昌府和永平县地方志并无关于永历君臣以及永国寺的相关记载。清民之际,“狩缅”叙事被重构,永历帝被重新赋予正统地位,有着极为深刻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不过同时也应看到,在经过了两百多年的社会变迁之后,明清鼎革所反映的王朝与民族的对立早已淡化。虽然云南在辛亥革命中属于响应较早且比较积极的一个省份,但在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政治过渡较为平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云南浓厚的国家认同,还有着来自外部的刺激因素。元明清以来,云南地方和云南百姓的国家意识日益增强,地方是国家的部分,百姓是国家的百姓,云南原本已与内地各省无异。然而到了晚清,云南直接面临着来自边界之外英法殖民者极其严重的侵略和压迫,云南的边缘意识再次萌发^[37]。以李根源为代表的云南革命党人不仅积极反抗清朝统治阶级的压迫,也积极抵御英国殖民者对云南的入侵。从某种角度来说,云南辛亥革命特别是对永历“狩缅”叙事的重构,毋宁说是为了推翻清朝的统治,不如说是对国家的认同,是对内地各省以及境外的英

法殖民者宣示:云南是中国的云南,云南的历史是中国的历史,云南的辛亥革命也是中国的辛亥革命。

结 语

至此,我们可以简要梳理一下“入缅”叙事的各个阶段。永历朝廷遗民在建构叙事时,应当只是为了让他们这位命运多舛的皇帝为后世铭记,同时也以此表明自己的忠心与节义。在新兴的清王朝的宏大叙事中,朱由榔没有什么位置。在这里,朱由榔谈不上皇帝,顶多是一个不肯顺从天命的前明落魄藩王。这两段叙事,鲜明地反映着王朝认同之争。时过境迁,当云南乡邦也开始参与叙事,朱由榔作为天子的身份得到了重视。云南在历史上虽然也曾有过自立之君,甚至与中原王朝一度分庭抗礼,但作为中原王朝的天子来到云南,朱由榔是第一人。在云南乡邦所发展的叙事中,云南不再仅仅是中原的边缘之地,云南也是天子驾幸过的云南。至此,“入缅”叙事跳出了正统论争,而是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云南与中原王朝的紧密联系。清末民主革命兴起之后,与前人乡邦叙事不同,云南的革命党人通过整理出版明代史事,修葺永国寺,重构了“入缅”的叙事主题。朱由榔明朝天子的身份再次被明确与强化,朱由榔与李定国被升华为上下一心、戮力抗争的抗清君臣。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的革命浪潮当中,拥有这样一段历史的边疆云南,其革命的正当性及其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主体性,不仅不亚于中原各省,甚至可以说更为突出。在这段叙事中,认同仍然是关键词,只是由王朝认同,转变为了国家认同。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永历入缅”叙事主题最终演变为云南的国家认同,是云南在中国历史内里中不断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中国的边疆之地,云南以独特的方式强化了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在那个内忧外患交迫的近代岁月中,“云南是中国的云南”这一认同则又更显可贵与激励人心。

注释

①参见李伯重:《小问题,大历史:全球史视野中的“永历西狩”》,《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此外,南明史或明清云南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对“入缅”问题也有一定涉及。关于南明史,参见谢国桢、顾诚、南炳文、司徒琳等学者的同题专著。关于“入缅”的原因与影响,关于明清云南的历史地理,参见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②邓凯:《也是录》,于浩编:《明清史料丛

书续编》第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另国家图书馆编:《稀见明史史籍辑存》第15册,线装书局2003年版。两部丛书所收《也是录》均为国家图书馆藏《明季野史杂钞》本,后一丛书目录将“也是录”误为“世是录”。《也是录》主要记载“己亥”(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以后事。全祖望在《鮚埼亭集外编》卷二九《题也是录》中记载:“邓都督《也是录》质实无虚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4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吕振宇认为国图藏《明季野史杂钞》本《也是录》为足本,包括刘茵《狩缅纪事》在内,“无一不是直录或转引《也是录》”。吕振宇:《简析邓凯和〈也是录〉》,《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③刘茵:《狩缅纪事》,丁红校点:《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安龙逸史·皇明末造录》,“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该本以浙江图书馆藏之抄本为底本。高国强认为“浙图本”与“国图本”之《狩缅纪事》均为善本。高国强:《〈狩缅纪事〉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按,对勘《也是录》与《狩缅纪事》,后者关于朱由榔入缅之前及押回昆明之后的叙述远较前者丰富,并不能说《狩缅纪事》“直录或转引”《也是录》。④参见杨德泽:《杨监笔记》,《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野史集成》第34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⑤高国强的《〈狩缅纪事〉概说》引乾隆《富顺县志》,认为刘茵为蜀人。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一六八《艺文志·记载滇事之书》(第1页)、卷一六九《艺文志·滇人著述之书·史类》(第12页)均著录刘茵《狩缅纪事》;卷一七〇《艺文志·滇人著述之书下》(第10页)则著录有刘茵《爱莲轩集》《乌私泣集》,谓其为滇人。刘茵或出生于四川而终老于云南,川滇方志各有侧重。⑥刘茵:《狩缅纪事》,第6页。顺治十六年二月即永历十三年闰正月,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二日丁亥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页。顺治元年七月,清廷决定于次年颁行“时宪历”,而永历朝廷仍然沿用旧历。⑦刘茵:《狩缅纪事》,第6、7页。邓凯《也是录》第262页没有记载二十六日抵达何处,但称二十八日所入为铜壁关且被緬人缴械。另据杨德泽《杨监笔记》第564页记载:“这里就是到外国的总路,地名铜皮关,往前还有六关。”“此处只有三条路,一条是往孟良去的,一条路是通交趾且有大江之隔,一条路是入緬甸去的。”可见,铜壁关距离緬关较远,此处緬关非为铜壁关,当为铁壁关。⑧刘茵:《狩缅纪事》,第20、21页。朱由榔被押至昆明的日期,邓凯《也是录》第283页记载为三月十三日。朱、李之死,《也是录》《杨监笔记》失载。返昆之后,邓凯被清军与朱由榔分开,杨德泽一直侍奉朱由榔之母。参见邓凯:《也是录》,第283页;刘茵:《狩缅纪事》,第20页;杨德泽:《杨监笔记》,第571页。⑨笔者认为朱由榔哭劝随行的举动,恐怕也不无担心人群聚集影响自己逃命的考虑。⑩碧鸡关位于昆明城西,是“入緬”必经之地。⑪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丁红校点:《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安龙逸史·皇明末造录》,“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页。屈大均(1630—1696)生平参见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前言第1—8页。按,《屈大均全集》未收录《安龙逸史》,或系编撰方不认为其为屈大均所作。⑫佚名:《明末滇南纪略》“西走緬甸”,丁红校点:《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安龙逸史·皇明末造录》,“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该书作者不详,成书时间不详,题“海宁三百二十甲子老人校录”,以“帝”称朱由榔。⑬胡钦华:《天南纪事》卷下,于浩编:《明清史料丛书续编》第8册,第262页。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外二种)》“旧钞本天南纪事跋”第47页及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天南纪事一卷”第549页对该书评

价颇高。胡钦华曾为永历朝金都御史,巡抚湖广,明亡后隐居湖南黔阳(今湖南洪江市)。⑭金钟:《皇明末造录》卷下《入緬纪略》,丁红校点:《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安龙逸史·皇明末造录》,“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该书题为“皇明”,署“旧京孤臣金钟编辑,海滨遗民童本削定”,遗民色彩跃然纸上。永历时,金钟曾为官河南道御史。参见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皇明末造录》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64—565页。对于朱由榔被捉回昆明后有清军欲挟为叛的记载,《皇明末造录》第165页在《狩缅纪事》的基础上对人数予以了数百倍的夸大:“逆贼吴三桂营中,有割辫欲讨贼反正者万人。”⑮戴笠:《行在阳秋》卷下,《三朝野记》,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04页。本书为上海书店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复印。《行在阳秋》对于永历朝廷入緬的过程记叙较为详细,作者一说为戴笠,一说为刘湘客。《三朝野记》在目录里将作者系于戴笠,该册的序言又称:“傅以礼则说是吴湘客。惟书中纪五虎事对于湘客颇多贬词,果湘客所著,似不应尔。是书真正著者究为何人,只好暂时阙疑了。”此处“吴湘客”为“刘湘客”之误。参见傅以礼撰,李慧、主父志波标点:《华延年室题跋》卷上“行在阳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戴笠另著有《怀陵流寇始末录》,见于《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41、442册,前明遗民色彩鲜明。《行在阳秋》均以“上”称朱由榔,无论其作者为谁,均可确定为前明遗民所撰。⑯佚名:《入緬始末》,于浩编:《明清史料丛书续编》第5册,第225页。《入緬始末》第224页有“自铜壁关入緬事悉载邓凯《也是录》”之语,可知该书成于邓凯《也是录》之后。⑰吴航所著《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第二章第87—141页“清朝官方的南明史撰述”对清朝官修明史的过程有详细论述。⑱参见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⑲刘猷廷撰,汪北平、夏志和标点:《广阳杂记》卷三“吉坦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0—141页。“吉坦然,江宁人,流寓衡阳。其尊人扈从永历帝上云南,坦然时尚少,亦随之往。甲午开科中式,授大理府云龙州知州,后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州。清兵至,投诚,授蒙自县知县。坦然随其父往来于迤东迤西诸处,知滇事最详。后出滇,流寓粤东,移衡阳焉。余问以滇中诸事,坦然多目击者。”⑳参见《广阳杂记》来新夏前言第1页及正文第2页北平王源撰《刘处士墓表》。㉑温睿临生平参见《南疆逸史》前言。吴航《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第四节“温睿临与《南疆逸史》”第178—195页,对温书作了专门考察。㉒相关狱案,可参见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江浙两大狱记》,《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429册,第672—673页。㉓吴航有专门论述,参见吴航著:《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40页。㉔计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点校:《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该书脱稿于康熙十年,其卷一五《吴三桂率清兵取云贵》简略记述顺治十五年至十七年事。该点校本的底本为原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清初旧抄足本。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该书卷四《緬甸散》记述了“永历入緬”过程。据其自序可知,该书成书时间最晚不超过康熙二十七年。冯甦:《劫灰录》,《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野史集成》第34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冯甦,浙江临海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曾在云南任职。《劫灰录》之“永明王僭号始末”“亡国诸人事考”所记内容与“永历入緬”有关。㉕冯甦:《劫灰录》,第324页。《劫灰录》当系沿用《皇明末造录》卷下《入緬纪略》第155页的记载,但《劫灰录》称清军为“大兵”,《皇明末造录》则称之为“贼兵”。㉖冯甦:《见闻随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6

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3页。按,毛奇龄卒于康熙五十五年。^{②7}叶廷珩:《吹网录》卷四“劫灰录补注跋并撰人辨”,《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63册,第54—56页。按,方、钱二人均为安徽桐城人。^{②8}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外二种)》“见闻随笔跋”,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3—54页;“劫灰录跋”,第54—56页。^{②9}郑达:《野史无文》,“晚明史料丛书”,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页。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表述来看,似将“珠江寓舫”与冯甦视为二人。^{③0}吴航:《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2页。按,王士禛,号渔阳山人,世称王渔阳。^{③1}参见邵廷采:《西南纪事》,《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野史集成》第32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③2}康熙《云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云南》第1册,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康熙《云南府志》卷五《沿革》,林超民等编:《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23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③3}《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一二〇《明唐桂二王本末·桂王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33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85页。该书纂成于乾隆三十三年。《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45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3页。该录成书于乾隆五十四年。^{③4}李天根撰,仓修良、魏得良点校:《燭火录》卷三二“大清圣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58页。李天根,江苏无锡人,《燭火录》成书于乾隆十三年。李天根生平及《燭火录》有关情况,参见该书的点校说明。^{③5}当然,清晚期“入缅”叙事,并非都没有清朝官方意识。嘉庆年间成书的《明纪》卷六〇《桂王始末》关于“入缅”叙事较为简略。陈鹤,江苏元和,嘉庆十五年(1810年)左右去世,《明纪》由其孙陈克家补完。同治十二年(1873年)成书的《明通鉴》在卷首“义例”中直言谨遵乾隆帝例,书“明”不书“纪”,“附纪”对朱由榔但称“桂王”,对其死事记载也比较中立。参见陈鹤、陈克家:《明纪》,《四库未收书辑刊》编辑委员会:《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208页;夏鼐撰,王日根、李一平、李珽、李秉乾等校点:《明通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2715—2724页。^{③6}屈大均为广东番禺人,王夫之为湖南衡阳人,戴笠为江苏吴江人,刘献廷为江苏吴县人,温睿临为浙江乌程人,黄宗羲、邵廷采为浙江余姚人,方孝标、方以智、钱澄之均为安徽桐城人。上述书写者大体可分为浙东学派和桐城学派。^{③7}清代云南方志作为带有官方性质的撰述,虽未回避“入缅”叙事,但刻意淡化的处理方式十分明显。^{③8}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第87册《滇粹》,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第430页及谢国楨《增订晚明史籍考》第572—573页对《滇粹》均有介绍,前者尤为看重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该传成书时间不详,或在刘彬生前的康熙时期。^{③9}刘彬著有《铁园吃语集》,见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一七〇《艺文志·滇人著述之书下》,光绪二十七年刊本,第12页;另有《永昌土司论》《重修〈永昌府志〉序》,见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文录”卷九,杨文虎等校注:《〈永昌府文征〉校注》第7册,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0—2343页。^{④0}2018年11—12月,笔者在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永平两县考察滇缅公路及博南古道期间,于永平县杉阳镇博南山腰永国寺亲见此碑。大理州永平县在民国及以前属于永昌(今保山)。^{④1}李根源、江逢僧:民国《永平县志稿》卷二,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方志篇》(本篇主编:郭惠青、李公)卷七,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④2}康熙《永昌府志》卷四《山川》,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社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5册史部地

理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18页。霁虹桥,古称兰津渡,是自西汉以来当地人民穿梭澜沧江的唯一渡口。近代以来,虽然滇缅公路及320国道从霁虹桥以北上游绕行,但已建成的滇缅石油管道及建设中的大理至瑞丽铁路仍从此处过河。^{④3}康熙《鹤庆府志》卷二三《古迹·眠龙洞》,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社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5册史部地理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页。此处原属鹤庆县,20世纪50年代划入洱源县。^{④4}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日),李根源参与蔡锷领导的“重九起义”,推翻清朝在云南的统治。起义成功后,成立云南军都督府,李根源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节制滇西文武官员,处理滇西事务。^{④5}杨世钰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本篇主编:张树芳)第6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此碑又称《博南山》碑,仍保存于今永国寺遗址。文中称“宁西禅寺”当即雍正元年供奉碑中的“西宁禅寺”。^{④6}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文录”卷三〇,杨文虎等校注:《〈永昌府文征〉校注》第9册,第3050、3052页。赵藩补书为“毗”“座”二字,由李根源所请。参见《毗卢宝座刻石》,杨世钰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第4册,第43—46页。^{④7}《修建永国寺碑记》,杨世钰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第6册,第70页。清代及民国时期,永平县隶属永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划归大理。

参考文献

- [1]石钟扬,郭春萍.方孝标文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7.
- [2]杨德泽.杨监笔记[M]//《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野史集成,第34册.成都:巴蜀书社,1993.
- [3]刘崑.狩缅纪事[M]//丁红.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安龙逸史·皇明末造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4]云南通志[M]//凤凰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云南:第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 [5]云南府志[M]//林超民,等.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23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126.
- [6]屈大均.安龙逸史[M]//丁红.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安龙逸史·皇明末造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7]金钟.皇明末造录[M]//丁红.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安龙逸史·皇明末造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165.
- [8]吴航.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100.
- [9]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3653—3656.
- [10]温睿临.南疆逸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29.
- [11]计六奇.明季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2]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9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3]刘献廷.广阳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7:5.
- [14]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38.
- [15]谢国楨.增订晚明史籍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6]冯甦.见闻随笔[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78.
- [17]佚名.残明纪事[M]//《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野史集成,第34册.成都:巴蜀书社,1993:474.
- [18]郭影秋.李定国纪年[M].北京:中华书局,1960:104.
- [19]佚名.入缅始末[M]//于浩.明清史料丛书续编:第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224.
- [20]康熙永昌府志[M]//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社编辑组.北京图书

- 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5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 [21]刘正寅.清朝前期民族观的嬗变[J].史学集刊,2014(4):3-9.
- [22]徐鼐.小腆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83.
- [23]庄士敏.滇事总录:上[M]//《四库未收书辑刊》编辑委员会.四库未收书辑刊第3辑:第1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24]邓凯.也是录[M]//于浩.明清史料丛书续编:第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260.
- [25]倪蜕.滇云历年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516.
- [26]王文韶.续云南通志稿[M].刻本.岳池: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5.
- [27]李根源.诗录[M]//杨文虎,等.《永昌府文征》校注:第4册.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1403.
- [28]《中国方志大辞典》编辑委员会.中国方志大辞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451.
- [29]沙文涛.吕志伊与云南辛亥革命[M]//范建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93-102.
- [30]解扬.乡邦文献与民族革命:李根源辑刻滇籍明臣著作的现实关怀[J].新史学,2012(4):163-206.
- [31]徐丽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第87册[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 [32]李根源.诗录[M]//杨文虎,等.《永昌府文征》校注:第5册.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1514.
- [33]李根源.诗录[M]//杨文虎,等.《永昌府文征》校注:第6册.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 [34]李根源.李晋王定国令谕[M]//李希泌.新编曲石文录.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78.
- [35]李根源.飭永昌府知府由云龙重修永国寺令[M]//李希泌.新编曲石文录.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72-73.
- [36]李根源.纪念李定国逝世三百周年[J].南京大学学报,1962(3):1-3.
- [37]林超民.云南:活动的边疆[M]//宋敏.边疆发展中国论坛文集2010·区域民族卷.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2012:242.

The Dynastic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Evolution of the Narrative of “Yongli’s Exiling into Myanmar”

Yao Sheng

Abstract: From the end of the 15th year of Shunzhi or the 12th year of Yongli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year,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Qing army, Zhu Youlang, Emperor Yongli of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fled from Yunnan to Myanmar. Four years later, Zhu Youlang was captured in Myanmar and executed in Kunming by the Qing Dynasty. After that, the loyalists of the former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the Emperor Yongli’s attendants, star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rrative of Yongli’s Hunting in Myanmar. Through the portrayal of the emperor’s goodness, the loyalists highlighted Zhu Youlang’s orthodoxy.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refused his orthodoxy officially, and regarded him as an ordinary vassal of the former Ming Dynasty. Thereafter, this narrative changed from the former Ming’s loyalists “Hunting in Myanmar” to the Qing Dynasty’s “Exiling into Myanmar”. With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Dynastic Writing in the narrative of Yongli’s Exiling into Myanmar fell out of the spotlight, meanwhile the people of Yunnan clearly expressed its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exiling narrative. With the rise of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narrative received the attention and reconstruction by the Yunnan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then became a tool for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and the declar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a word, the narrative evolution from “Hunting in Myanmar” to “Exiling into Myanmar” then to “Hunting in Myanmar” from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reflected the opposition of different standpoints, the aspirations and demands of different forces and groups, and the themes of different times.

Key words: Emperor Yongli; Zhu Youlang; Myanmar; national identity

责任编辑:王轲 长亭